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书评

震撼人心的历史画卷 叩击灵魂的时代鸣钟

《大湖西》的主旨是写史,而它的作者杨义堂却独具匠心地采取传记文学的艺术形式,完全避免了一般史书的那种枯燥与干涩,使《大湖西》读起来如享甘醇,真有点陶醉,使之平添了无穷的艺术感染力。

《大湖西》开卷伊始,把后来成为湖西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的郭影秋作为切入点,可谓慧眼独具。将郭影秋的个人奋斗,成长成熟经历与整个湖西地区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使全书有了更多故事,也给我们以重要启示。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只有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生死与共,个人的生命才能更有意义。

不仅如此,《大湖西》一书中将郭影秋的个人婚恋、恩怨情仇、生离死别与革命事业的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扣人心弦,让人忍不住要一直读下去,一直到明白最后结局。这也是《大湖西》一书的魅力所在。

纵观《大湖西》一书,从历史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已达到相当完美的统一,也开创了一个地方史书写作的全新先例。《大湖西》一书,不仅填补了一项重要的历史空白,而更为当今社会奉献了一部宝贵的红色文化经典。

(湖西红色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
李汉玉)

郭影秋的家在微山湖南岸、徐州铜山县棠张乡马兰村,村里只有他一家姓郭,是清末黄河发大水时从微山湖边逃荒来的。他家无片宅尺土,四处求告,才被允许住在一家朱姓地主闲置的草房里,被人称作“住房户”,为了养家糊口,又不得不租种地主家的土地,所以又被称作“种地户”。除缴纳苛重的租税外,还要无偿为地主家干活,是村里最穷、最苦的一户人家。

1909年初秋的一天,郭家风雨侵蚀的草棚里传来一阵阵婴儿响亮的哭声,这家的第二个儿子降临人间,父亲给这个孩子起乳名玉昆,大名叫郭影秋。这孩子从小看到父亲为地主家干各种杂役,还经常受村里人的欺负。郭影秋的父亲性格倔强,遇到不公的事就找人理论,经常受到人家的毒打。郭影秋的母亲胆小怕事,为了息事宁人,偷偷地将自己家的米、面送人,以求得人家的照顾。而父亲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里还要对着妻子发泄,话不投机就动手打女人。因此,他的母亲承受了更多的苦难和艰辛。

在郭影秋12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得了重病,但仍忍着病痛埋头干活,直到病重发作,倒在了地里。因为请不起医生,几天后便含恨去世。母亲临死前看着弟兄俩,少气无力地说:“孩子,娘不行了,不能陪你们长大啦!”又叮嘱哥哥说:“以后要好好照看弟弟。”说完,便闭目长逝。

郭影秋趴在母亲的身上哭得死去活来,母亲埋葬时,用门板托着,盖着苇席下葬,连口像样的棺木也没有。

父亲为了改变家庭的命运,拼了命也要让这个孩子读书。郭影秋先是在本村的私塾读《四书》《五经》,他读书很刻苦,打下了很好的古诗文底子。13岁时,他想进新学堂读书,父亲托亲戚安排他到大彭第一小学读书,因为徐州历史上也叫大彭,所以这所小学其实是徐州市的第一小学,据说教学质量很好。有一位名叫邢筱亭的年轻老师,白白净净的,戴着一副眼镜,长得很帅,思想比较激进,上课的时候,

经常批评时政。邢筱亭看到郭影秋学习很好,经常表扬郭影秋,让郭影秋对未来感到很有信心。

小学毕业后,因为师范学校不收学费,还包食宿,郭影秋报考了铜山师范学校。因为这所学校当年没招一年级新生,郭影秋就直接到二年级当插班生。他已经18岁了,是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但他学习成绩优异,每次都考全年级第一名,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郭影秋被推举为学校学生会主席兼膳食委员会主任。学校里有位老教师叫韩席筹,人很和善,郭影秋由于家庭经济困难,韩老师曾多次慷慨资助。郭影秋班里有一个同学叫朱成山,是徐州城里人,虽然是富家子弟,但是没有纨绔子弟的恶习,郭影秋和他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许多年以后,郭影秋成了共产党湖西专署的专员,为了做城市情报工作,还派人到徐州找过他们。

1929年,铜山师范发生了一场学潮,郭影秋因为参加学潮而被迫离开学校,因为没有拿到毕业证,不好找工作,郭影秋的父亲很伤心,郭影秋又继续考学,先后到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和江苏师范学院读书。

江苏师范学院不在南京,而是在苏州。郭影秋和一位家在上海的女同学凌静比较好。凌静出生在上海的小巷子里,也是上海滩上的穷苦人家,但是长得脸庞俊秀,娇小玲珑,穿着一身得体的丝绸旗袍,说话吴依软语,娇娇滴滴。二人都思想进步,有共同的爱好和理想,经常在一起说悄悄话,因此,确定了恋爱关系。

毕业后,郭影秋回到徐州,到徐州民众教育馆担任历史教员。徐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赵光涛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知名教育家,1901年出生,徐州铜山人,早年求学时曾经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928年参加国民党,担任南京市党部文艺宣传委员,创作了多部剧本,有时候还亲自登台演出。赵光涛的业余爱好就是写剧本,郭影秋跟着他学习研究剧本写作,二人成了莫逆之交,郭影秋的剧本写得也有模有样,这为他日后在抗日根据地写戏奠定了基础。

(未完待续)



曲阜碑刻(四十三) 元阙里祭器碑

王俊毅

元阙里祭器碑,全称“至元三十一年阙里祭器碑”,立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八月,由李淦撰写碑文,杨垣负责篆额。此碑高1.6米、宽0.84米、厚0.17米,碑文共24行,每行刻36字。此碑现存于孔庙后院东路崇圣祠东南。元阙里祭器碑是记录元代祭祀孔子庙时所用祭器的碑刻,碑文详细列举了祭器的种类、数量、质地、用途等,反映了元代祭祀文化的特点和礼仪规范,揭示了元代孔庙祭祀所用祭器的相关信息。

元代是由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其统治阶层的文化与汉族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然而,为巩固统治,并表达对汉文化的尊重,元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对孔子的祭祀,将其视为彰显元廷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元代统治者认为,通过尊崇孔子和弘扬儒家文化,可以赢得汉族士人的支持,从而稳固其统治地位。在元代,阙里孔子庙的祭祀活动尤为频繁和隆重。每次祭祀都充满了庄重与肃穆,祭品种类繁多,祭器制作精美,反映了元代社会对孔子的尊崇和敬仰。这些祭祀活动不仅是对孔子的纪念,更是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元代祭祀文化融合了汉族、蒙古族等多种文化的元素,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元代祭祀文化不仅传承了前代的祭祀传统,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扬和创新,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元代祭祀文化对于研究元代政治、文化、教育等方

面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它反映了元代社会对孔子的尊崇和敬仰,以及儒家思想在元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它也为我们了解元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手工业技艺水平以及文化审美观念提供了重要线索。元代的祭孔活动在元代社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是元代皇帝巩固统治、彰显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更是儒家思想传承和发扬的重要途径。

而元阙里祭器碑,作为记录元代孔庙祭祀所用祭器的重要历史文物,不仅详细列出了各种祭器的名称、数量,还反映了元代社会对孔子的尊崇以及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在这些祭器中,有一些因其独特的造型、制作工艺或文化寓意而显得尤为突出,如下文将要介绍的牺尊和象尊。

牺尊,通常被塑造为牛、羊等动物的形状,以象征古代祭祀中的祭品,体现了古人对祖先和神灵的敬畏与敬仰。在元阙里祭器碑中,牺尊以其生动的动物形态和精湛的制作工艺而引人注目。牺尊的

头部往往被雕刻得栩栩如生,身体部分则巧妙地与酒器相结合,既体现了古代工匠的巧妙构思,又展现了祭祀文化的庄重与神秘。

象尊,则是以大象为原型进行塑造的祭器。大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吉祥、力量和智慧,因此象尊在祭祀活动中传递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元阙里祭器碑中的象尊往往被塑造得高大威猛,形态逼真,既展示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又体现了对大象这一吉祥象征的崇敬之情。

牺尊与象尊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将动物形态与祭器功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满足了祭祀活动的需要,又增添了祭器的艺术价值。这种结合不仅体现了古代工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不仅承载了祭祀文化的深厚底蕴,还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爱”与“和谐”理念。与其他祭器相比,牺尊与象尊在造型、制作工艺和文化寓意等方面都显得尤为突出。它们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

元阙里祭器碑,这一承载着元代祭祀文化与儒家思想精髓的历史文物,以其详尽的碑文内容,为我们揭示了元代社会对孔子的尊崇和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为研究中国古代器物和孔庙祭祀历史等课题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史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特殊的文化意义。